

思想“在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

宋学勤 李晋珩

【提要】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视野呈现出从宏观向区域下移的趋势。这一趋势虽在总体上推进了研究的精细化,但不少区域史研究沉溺于地方史料的堆积和单纯事实的叙述,暴露出思想的缺位。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思想引领的区域化研究不能带来学科知识的实质性进步,造成千孔一面的“故事型”学术成果泛滥。正因如此,从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人有必要秉持总体史的问题意识,以发掘区域的研究意义为目的,审视“人”的主体性,并寻求可资对话的“中层理论”。当代社会史研究如此才能从繁杂琐碎的地方史料中找寻到思想的“在场”,才能为书写有思想和灵魂的大历史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当代中国史 社会史 碎片化 区域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初,作为社会史研究最早倡导者之一的冯尔康先生,曾提出“历史学一定要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加强现代史的研究”这一命题。^①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现代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社会史,其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上,还是理论准备上,都不及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研究那样相对健全。具体表现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被忽视、缺乏学术史对话的自觉意识等问题。但关键在于,当代社会史研究在视野下移发掘“史实”的趋势中忽视“史识”,往往满足于讲清楚一个事件在地方的来龙去脉,而轻视对事件所承载意义的阐明与解析。这类研究貌似“还原”了有限区域内的“原貌”,或貌似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形式上似乎秉持了历史研究或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但思想上的缺位是其不容忽视的缺憾。止于叙事而缺乏思想,这是阻碍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并降低其整体研究质量的突出问题之一,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当代中国社会史(又称中国当代社会史),是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它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变化过程及其规律”,^②尤其强调普通民众生活层面。从学科关系上看,它既是当代中国史的社会史分支,也是中国社会史的当代史部分。但相较于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研究,当代社会史研究有更广泛的文献资料被保存下来,有健在的历史亲历者可提供口述史料,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7BDJ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朱佳木《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

在跨学科视野上有更广阔的借鉴空间。

近些年来,在社会史研究勃兴的潮流中,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性和价值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这种关注来自于当代中国史学界内外两个方面。

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内,社会史的研究价值初见于20世纪90年代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所涉及的一些相关领域(如人口问题、阶级阶层问题)。^①进入21世纪后,当代中国史学界在同1949年后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比较之下,开始关注自身研究范式的独特性。一些学者就此提出“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②和研究“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③的倡议。当代社会史研究在学科分化独立过程中萌发。2007年,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的号召下,有学者呼吁“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④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的创立和2011年下半年两个研讨会成功举办后,当代社会史研究逐步发展到“体系化阶段”。

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之外,愈来愈多的学者从中国社会史的古代史和近代史领域以及社会科学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投入到对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界为例。在对1949年前的成都茶馆进行微观史视角下的研究后,王笛将考察的时限推进至20世纪后半叶,探讨了茶馆这个公共空间在集体化时期及改革开放后的兴衰。^⑤这种趋向体现了当代社会史对于中国社会史和相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拓宽研究视野和扩充实证材料意义上的学术价值。从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可以从近代社会史研究上找到借鉴空间。在王笛主编的《时间·空间·书写》中,多位学者从社会史研究的视角,讨论了近代中国的守时观念、优生话语、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近代城市公园的政治意义等问题。^⑥这些问题可以为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供新颖的切入点。

从当代中国史学科内外的发展趋势上看,当代社会史研究已逐渐成为新兴的学科增长点。有些学者从社会史的视角发掘新材料(尤其是地方史料)来修正和深化学界既有的研究结论。如根据某省民办教育发展的个案,有学者修正了当代中国民办教育在集体化时期受到强制阻断的既有认识。^⑦有些学者为过往被忽视的史料赋予研究意义。如近年来在国家和社会愈发强调医疗卫生和生态环境问题重要性的社会氛围中,当代中国史研究界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除了实证研究,一系列理论问题(诸如当代社会史的定义、学科间关系、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⑧尽管相较于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目前这种讨论尚未完善,但至少体现出当代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和分支学科的自觉。

(二) 转向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利弊

在当代中国社会史受到关注的同时,学界呈现出将其视野从宏观向区域下移的趋势。这种将视

① 邓力群《国史写作不应忽略的若干基本内容》,《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杨凤城《关于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邹兆辰《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④ 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⑤ 人大新闻网-院系速递-马克思主义学院《澳门大学王笛教授做客胡华大讲堂》。news.ruc.edu.cn/archives/150386[2016-11-02]

⑥ 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⑦ 徐智德《中国当代民办教育受过限制但并未中断——以陕西省民办教育的发展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⑧ 参见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宋学勤《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朱佳木《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金铮《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朱汉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史学集刊》2012年第5期;常利兵《资料、视角与方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行龙《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野地方化或区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几乎成为主流范式。^①“空间”这一维度被置于首要地位,许多研究采取了“以甲村为中心的考察”、“以乙县为例”或“某某制度在丙地”等“空间”视角。这一模式在当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中占较大比重。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学界所使用的叙事框架和史料,这种范式一开始是让人振奋的,因为它从形式上区别于以往学界的空疏学风。20世纪90年代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常常墨守同样的叙事框架:某某制度或事业经历1949年以来的恢复时期后,在前17年于曲折中取得卓越成效,但在“文革”时期被中断,后在拨乱反正中重归正轨,并于改革开放时代走向新的高度。这类论文使用的史料主要来自中央文献汇编和国家统计局年鉴等中央级别的文献。其叙事过程和结论高度相似,所不同的往往只是研究对象。新兴的区域史研究往往对研究对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界定,并多采用地方档案、地方报纸、地方志书和当事人口述史料。

这种通过发掘地方资料进行区域史研究的取向虽然把研究对象从“全国”转换为“地方”,但实际上可以深化我们对“全国”的认识。首先,它揭示了国家政策在地方的贯彻实施,补充说明了“全国性”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团结中西医”政策为例。有学者通过某省的个案,揭示了这项全国政策在地方执行中两个易被忽视的视角:(1)强调中医以打击西医的宗派主义;(2)中医药材的易得和广大农村医疗人员的中医学背景。^②这就为此前学者对基于中央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所作的考察提供了佐证。^③其次,区域史研究往往为国家政策的“文本”(政策文本和总结性文本)提供了实践过程,考察了同一国家政策因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及所采取的不同应对办法。如同样讨论1949年后《婚姻法》的颁布及新式婚姻制度的确立,有学者从“全国性”视角叙述这一过程,^④也有学者从华北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为其提供佐证和说明。^⑤尤其是在黔东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婚姻制度的变革历程同民族问题交汇时,当地要采取同其他地区不同的办法和步骤。从这两点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区域史研究因其立足于地方经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去反思一个“全国性”的过程,而将承载更高的学术价值。

区域社会史研究在讲述一个个“村庄故事”时,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史实”和“史识”兼备。这类研究通过发掘具有多样性的地方史料,丰富或深化了原有的历史认识。二是有“史实”而无“史识”。这类研究中意于将区域内的一切信息囊括其中,未能从研究意义上考虑区域与总体的关系。三是有“史实”而无新“史识”。这类研究试图利用地方资料以“还原”国家政策的落实过程和全国性事件在地方的影响,但没有基于地方经验的特殊性而得出新的历史认识。有“史实”而无新“史识”,是表明研究者未能把握当代社会史的多样性,而使收集整理地方资料的工作降格为一种叙事上

①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为例。自1994年创刊以来至2016年,该期刊共刊载社会史研究论文176篇(不含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其中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论文共71篇,约占40%。在该期刊上,区域社会史研究最早出现于1999年。此后若以一年刊载5篇为界限,2006—2012年是区域社会史研究论文发表的勃兴时期。自2012年后,每年约有4—5篇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论文得到发表。从研究对象上看,上海(15篇)、北京(13篇)和河北(10篇)是研究者关注的热门区域。这得益于当地有健全高效的科研队伍和相对整全开放的地方资料。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如山西、四川、江苏)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仅仅是从《当代中国史研究》得出的数据,若进一步考察地方科研院所和党研室主编的期刊以及各高校党史国史专业的硕博毕业论文,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所占比重会更明显。

② 张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政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省为中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③ 田刚《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④ 刘维芳《新中国新式婚姻制度的初步确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

⑤ 关于《婚姻法》的推行及新式婚姻制度的确立在上述地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请见《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张志永、李洪河、范连生等学者的相关论文。

的操练。在现有学界，“史实”与“史识”兼备的研究实为少数，目前占大多数的是有“史实”而无“史识”和无新“史识”的作品。后两种研究在当代社会史研究向区域转向的同时，其研究价值止于积累史料，而失去增进历史认识的深刻意义。或言之，这是视野下移所带来的研究琐碎的情况。

二

在历史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现在出现的共同问题是：迄今为止，“村庄故事”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并没有同步地带来历史认识与理论建构上的实质性进步。学界挖掘了大量的区县级档案，但还是很难在相对丰富的微观史研究基础之上对宏观历史得出更深刻的认识。这使得我们必须反思区域的研究价值，“村庄故事”能否堆积出一个中国？^①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一）思想在区域史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在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中，“碎片化”/“碎化”（Fragmentation）这个概念是最常被提及也最容易产生歧义的。这个词本可以用作一个中性词，但在区域史研究的语境中往往褒贬不一。有观点主张“碎片化”是指历史学科的精细化，也有观点认为它是研究者视野狭窄的代名词。^②在应用上，“碎片化”往往同时包含研究对象区域化和研究意义琐碎这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些观点更认为后者是内在于前者过程之中的。这种现象折射出学界对这两个含义之间关系的探讨还不够完善。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区域化是否会导致研究意义琐碎的弊病，取决于研究是否具有“思想”。这种“思想”不是泛泛而谈的知识储备或理论修养，而是一种具体的反思能力和学术自觉。走向区域的研究者，必须要有意识在地方史料上找意义，找问题。以作为中国史研究经典之作的《叫魂》为例。作者没有满足于对这桩清中叶的妖术恐慌作悬疑小说式的叙事，也没有止于揭示君主、官僚和平民百姓三者之间的反应和行为存在差异这个浅尝辄止的解释，而是在同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君主制理论的对话中讨论“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③，并从中得出更深刻的见解。除此之外，就区域的研究价值而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和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等概念，都是研究者基于区域性个案（或跨区域的）而得出的总体性解释框架。上述这些研究并未因研究对象的区域化而使其失去思想上的底蕴。

“思想”的缺位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种表现是：一些学者往往在论文开头以颇为简略的方式“穷举”前人所述，然后挑一个以往缺史料支撑的地方去开题立意，并名之曰“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白”。健全的学术生态是建立在“对话”之上，鲜有“初来乍到”的问题。即使如相对论那样的颠覆性理论，也是建立在对牛顿力学等经典理论的反思性批判之上，不是凭空形成的。研究者在开题立意时，要明确自己是在哪个研究领域的讨论中同哪个（或哪些）学者的理论或观点展开对话。反观所谓的“填补空白”，往往是因研究者忽视前人为何在学术史脉络中对该问题有所忽略这个现象造成的。不明晰前人为何在何处留下“空白”（是当时整体认识水平有限，还是当时学术界主流范式的局限性导致的，还是当时相关资料的缺失），那“填补”这个“空白”的努力就很难深入。还有一种表现是对同一命题进行重复证明，而忽视其他可深入探讨的领域。一些个案叙事中即使出现可供深挖的新问

① 宋学勤《以思想引领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3日。

② 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33页。

题,也会被既定叙事框架所搁置。比如在1949年后国家对社会的改造与接管中,组织资源的利用和宣传资源的调动在不同个案里反复出现。这在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斗争、军管会对清华大学的接管工作、成都市政权的接管工作、50年代上海妇女参加集体生产等研究中都有涉及,却没有论文专门就动员和宣传方法本身展开比较分析。^①而作为国家能力的重要部分,社会动员能力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②区域史研究如果没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仅仅停留在“村庄故事”的个案叙事的话,再多的“村庄故事”也构不成总体性的历史图景。

(二)对两种常见倾向的反思

米尔斯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曾对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抽象经验主义”和“科层制气质”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有人会说,这些研究必然会累加起来,使我们能从中归纳出关于社会的有意义的结论。在我看来,这种辩解的思路假设了如下观点,即把社会科学当作一种奇怪的砌砖成墙的努力。”^③而这种“抽象经验主义”是“为科层组织所应用,尽管它自然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意义有时也被作为意识形态”。^④米尔斯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提出质疑,其论述对视野下移趋势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有借鉴价值。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村庄故事”发掘得不够。待发掘的数量足够多,资料累积得足够丰富,“大历史”自然而成。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有两点理由。首先,在理论上,地方性资料是无穷尽的。尽管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限制,研究者接触一些地方档案等资料时会遇到困难,但已知存档编号的材料之浩瀚就已超出单个研究者的掌握能力,恐怕一位学者穷其科研生涯也无法将全国各地资料中心的全部史料通览无遗。即使整个学界穷尽每一间资料中心的全部资料,也还有不可计数的未记载于现有文本的史实有待挖掘。更何况随着学科自身演进的过程,不断会有新的领域被纳入视野,如近些年受到关注的医疗卫生史。这正是田居俭指出当代社会史研究要避免不断在“山重水复”中徘徊的原因。^⑤其次,从方法论上讲,每个“村庄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闭合的,具有不同的背景与解释变量,在不同历史事件上,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有不同的权重。例如,在改造沿海渔业社会的问题上,广东在这一过程中注意汉民同疍民之间的“民族矛盾”,^⑥而浙江则集中于将生产过程集体化和移除迷信崇拜等方面。^⑦因此,就改造渔业社会这项全国性政策的推行而言,究竟是以关注族群矛盾为首还是移除迷信崇拜为首,这也是个案无法解释的。如果个案的研究没有指涉超越个案经验本身的解释框架,其研究价值是相对有限的。因为地方史料的无法穷尽和地方个案的闭合性,“村庄故事”的累积不仅是费时费力的,而且并不能必然带来总体历史认识的深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应以发掘新材料为先,其次才是阐发“史识”。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对资料的阐释只不过是一种基于作者个人性或时代性偏见之上的想象。就此,本文同样有两点质疑。

① 董向前《试论建国初期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刘颖《北平军管会对清华大学的接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吴珂《中共对成都接管中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邱国盛:《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妇女解放与参加集体生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②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部分“国家建设”。

③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陈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9页。

④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127页。

⑤ 田居俭《中国当代社会史要重视理论指导》,《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

⑥ 詹坚固《建国后党和政府解决广东疍民问题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⑦ 王玉波、王瑞红《新中国成立初期渔业社会变迁的考察——以浙江省洞头列岛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首先,忽视新“史识”这个主张本身也有意识形态色彩。这种主张试图把历史学简化为乾嘉时期的“识字功夫”,借以悬置乃至拒斥社会科学的学术影响以及当下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①若从历史学的思辨及审美志趣而言,这本无可厚非。但就现实而言,这种主张往往在实际上持“革命叙事”或“现代化叙事”的标尺以衡量史料的研究价值和不同研究所得出结论的“正确性”。这种主张通常预设一套话语作为超时空的是非标准,并由此做出评判:凡不能佐证其话语绝对正确的史实皆是无用的史实,凡不合其话语体系自洽性的研究结论皆是不正确的结论。从史学研究的操作规范上,这就阻滞了知识增长和健全的交流机制发展,因此是有害无益的。其次,史料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作为研究活动的主体,研究者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而史料和研究方法是从属于研究者的材料和工具。历史研究可被交流认可的价值和可资借鉴并增长学识的“使用价值”都来源于从史料中所发现的独到见解和深邃思想,而不是史料本身。从这个思路出发,当代社会史研究光有新史料新选题是不够的,正如珍贵的食材本身往往并不天然就是美味佳肴一样。仅仅有新史料新选题的研究可谓是合乎操作规范的,但在学术价值上很难称为“合格”的。

区域史研究不应当止于史料的累积并悬置对史料意义的阐释。若以知识增长为目的,以“矿工”的态度扩充新史料却置总体的历史脉络不顾是徒劳无益的。在目前国内的硕博士培养模式上,相关的各科系往往鼓励学生就近或回到家乡收集资料,开展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地方的社科基金项目也多鼓励研究者将其研究依托于地方的实证材料上展开。这都深化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下移的趋势。若新一代的学人满足于仅仅成为在某一细分领域知之甚多却在思想上匮乏的“技术专家”,这将是学界的遗憾。因为即使再多的以“村庄故事”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被收录,其对于书写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历史”的作用,也依然只能停留在补充史料的层面,因而不能由其个案阐发出总体史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的本质特征。将地方个案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才是确立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意义的基础。没有“意义”的区域史研究只能落入史实罗列和收集信息的窠臼,倒回流水账式叙事的老路。那样的历史,克罗齐称之为“假历史”,或以 E. H. 卡尔之言来说“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②

三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有其总体的同一性和规律性,也有地方经验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开题立意时应当注意:(1)从其总体同一性出发,确知所研究的问题具有总体史的研究意义,而非对既有总体认识和叙事框架的简单重复或有意搁置不顾;(2)从地方特殊性出发,发现地方性史料同既有认识之间的不同之处,并基于这种不同提出独特的解释思路;(3)将区域史研究重新置于学术史中审视,再以总体史的问题意识来确立其研究价值。若能满足这三个条件,区域视野下的当代社会史研究将会是“形”(史实)“神”(史识)兼备的上乘之作。其中,确立总体史的问题意识,是使思想“在场”的前提。但这个前提也恰好是研究实践中常被忽视的。需要进一步探明的是,作为增进社会史研究深度的方法,区域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史兴起之时的初衷?视野下移趋势下的当代社会史研究在何种角度上要遵循回归“总体史”的诉求?这需要我们回顾社会史研究的

^①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②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7页。

发展脉络,以及分析当时的学术环境。

(一) 研究“总体史”是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初衷

从中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研究“总体史”(Total History)是共同的初衷。从现代史学在欧美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来看,社会史的兴起都是源自于对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史料崇拜和简化主义的一种“反动”。马克·布洛赫等人正是通过重新发现那些“边角料”的价值,而实现研究总体史之目的。^①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拓社会史这一新领域,也经历类似的历程。开展社会史研究,是为了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恢复历史研究对象的完整性,给予历史学有血有肉的阐述,并以此作为历史学发展的突破点。^②

如果将历史书写视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话,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一种制度性的更替。因此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社会”,往往不是所谓“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这样具体的概念,而是一个模糊而流变的范畴。这也导致中外学界对社会史研究的定义没有一个定论,以至于诸多理论问题,如“社会史”到底是专门史,还是方法论,还是“历史”这个概念本身,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是否应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学者们对此往往莫衷一是。其实,社会史研究与此前的传统史学研究的关系可以用“中心—边缘”这对概念来理解。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政治往往是“中心的”,而“社会”是“边缘的”;中央是“中心的”,而“地方”是“边缘的”;上层是“中心的”,而“下层”是“边缘的”;宏观趋势是“中心的”,而专题和区域是“边缘的”。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关注如“国王的触摸”那样大事年表之外的历史事件,关注非西方民族的社会,关注工人及工人阶级的形成,关注医疗卫生史,都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关注“中心”之外的历史因素,以追求对人类历史的全面反思和完整理解。因此,无论社会史研究以何种方式走向“边缘”,它的核心动机都是一种“总体史”的诉求。作为走向“边缘”的一种方式,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就是其中一个环节。

向区域转向的趋势是符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中国社会史研究整体趋向的。在海外,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史研究界在反思后殖民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柯文“中国中心取向”为代表的倡议,并在其倡议的四条特征内,强调了从“空间”这一维度对宏观历史的“横向分解”(区域、省、州、县与城市)和“纵向分解”(下层社会历史)。^③在国内,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之后,也大体经历了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再到“新社会史”三个阶段。^④在9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走出以“中国—世界”这种关系为参照考察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思路,开始向“空间”转换。社会史研究的参照系不再是“中国—世界”,而是“中国”概念之下的各类次一级单位,尤以“村落”为典型。^⑤

研究对象的区域化在推进社会史研究深化的同时,也暴露出问题。比如杨念群批评当时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对“村落”的考察在着眼于“宗族”和“庙宇”的同时,并未意识到“进村找庙”这种方法论的适用性,尤其是在不同区域同政治中心控制的距离存在区别时,这种方法应用范围的局限性。^⑥在

① 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创建者: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

②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③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1页。

④ 李小尉、朱汉国《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⑤ 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⑥ 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这个层面上,区域化的趋势背离了研究“总体史”的初衷。因此,若以明清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为借鉴,当代社会史研究在走向作为“边缘”的区域化时,研究者要特别处理好社会与政治(以及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的关系。

(二) 政治作为研究社会史的一个范畴

社会史是理解政治的一个有效的视角,而政治也是研究社会史的一个有用的范畴。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政治”的运作机制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以“政治”作为理解社会史的工具,也会有创新性的见解。赵世瑜就指出要在一个漫长的社会史中去分析政治,而“国家的在场”是分析华北区域社会史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其就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的研究,正是以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为视角展开的。^①杨念群也指出现代政治对塑造近代中国“个人”的“身体”这一过程的主导作用,国家发起的社会动员,如“爱国卫生运动”,将传播现代卫生知识改造为激发民族主义和强化国家对社会整合和渗透能力的工具。^②以政治作为分析的视野,再以社会史的思路去讨论近代中国的医疗史,使得这一类研究呈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范式使研究者更专注于地方的特殊性,而往往忽视作为跨区域力量的总体社会变迁过程。甚至为了有意维持其特殊性,研究者会以远离“政治”为名去淡化国际性和全国性事件在地方个案中的影响。张静如指出“严格地说,能够上史书的群众生活,也很难完全脱离政治。表面上似乎与政治无关,其实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③所以视野下移趋势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不能搁置政治(及政治史),而要达成与政治(及政治史)的沟通。

例如,王笛的《茶馆》以“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和“(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这两条线索展开,^④将区域史研究置于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中国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基层的历程中考察,并将哈贝马斯的经典理论“公共领域”引为其中层理论,提供了基于其区域史研究而得出的中国史视角。正如作者所论,“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⑤微观视野与宏观历史进程的有机结合使该著作对成都茶馆的考察获得超出区域的研究意义,也使该著作在讨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过程时得到了地方史料的有效支撑。

社会史研究中很多“史实”和“史识”兼备的佳作都有这种特点:它们看似是一连串纯粹的事实叙述,但在选材和叙事逻辑安排上体现出这些作品在思想上更深刻的理论关怀。它们没有流于史实,也没有作过度阐释,而是在同政治(及政治史)的沟通中,形成了总体的历史脉络与区域史研究之间的相互支持。这体现了研究者在宏观与微观之间调度自如的叙事技法,和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思想意识。

(三) 政治之于当代社会史具有总体史的意义

“总体史”与“整体史”是社会史研究中常被提及的概念。“整体史”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

①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② 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8卷,第27—37页。

③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⑤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2页。

研究对象的空间性。而本文所采用的“总体史”意在强调区域史在历史哲学层面上同超越区域的总体所共存的变迁逻辑。同明清社会史不同,当代社会史从最初阶段就有统一的中央政权。与国家以地方士绅为中介的模式不同,国家以隶属中央的党政干部为中介而整合社会。此外,同古代社会史的中央政权相对长期的疏离不同,国家作为革命者干预社会,并带有强烈的现代化意图。这说明当代社会史中的区域不是最终“变成了中国”,而是从最初就作为“中国”而变迁。这种“中国性”不是当代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终点,而是起点。

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这使有些研究者在把握区域史研究中地方社会的历史演变逻辑时感到无所适从。但事实上,在剧烈变迁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思想与当时整体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制度环境相适应(某种程度上是前者塑造了后者),并随时代背景的变迁而与时俱进。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变迁就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息息相关。该项制度的指导方针,经历了从集体化和社会运动的思路,转向鼓励社会 and 个体承担的思路,再到以国家为主并鼓励多方参与的思路这一变迁过程。^①这一总体的变迁过程证明当代中国社会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演变逻辑。这种切实存在的阶段性和演变逻辑同时也表明了总体的历史脉络本身。

对于研究者而言,承认这一脉络应被理解为研究主体所应具备的总体史的问题意识。它是指当代社会史研究要在“长时段”下在散碎的现象之中去探寻那些看似不变的“结构性”的东西。^②总体史的问题意识,就是要使研究者的主体性认识同这一总体性演变逻辑之间达成契合性和适应性。若从一开始就秉持总体史的问题意识,研究者就能在收集地方性史料并开展区域史研究之前便明确其课题具有超越个案本身的学术价值。

四

(一) “缩影说”同样是思想的缺位

总体史的问题意识是开展有思想“在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但这仍然不够。它只是提醒从事区域史研究的研究者要“合题”,但并不能独立解决学术创新匮乏这一问题。在当代社会史学界,早有作者提倡区域社会史研究要经过“地方”、“地方至全国”、“全国至地方”三次视野的转换,进而形成某一全国性研究的“上海视角”、“北京视角”、“江苏视角”等有地方独特性的解释。^③但现有研究往往没有经过“地方—国家”这一往复的思辨过程,故仅仅为某一全国性研究提供同质化的“上海过程”、“北京过程”和“江苏过程”。一些研究在形式上回归“总体史”的研究,也有可能背离“总体史”的初衷,形成思想的缺位。“缩影说”就是对这一类研究颇为精准的描述。

“缩影说”是指研究者在面对地方性资料的零散琐碎的状况时,急于去证明其“区域史”研究就是“总体史”研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急于以“地方”就是“总体”的一部分为理由,去把零散的史实整合起来。区域史研究在此被简单地叙述为全国性研究的投射。^④实际上,研究琐碎和“缩影说”是两

① 姚力《中国共产党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行龙《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③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5页。

④ 杨念群《“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个逻辑上相悖却在实际上常常共存的问题。研究琐碎的情况过分突出了地方特殊性的独立存在，“缩影说”又否定了这种特殊性存在的合法性。这使研究者被困在地方资料和宏观脉络之间踟蹰不前。如此一来，研究者墨守“缩影”之成规，面对有创新性的新材料也会因不知其研究价值而视而不见。更进一步而言，他们收集到的所谓“新材料”，往往强化了带有精英史意味的历史书写。上述讨论是针对单一区域而言。就超越各个区域史研究的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其多种解读视角。漠视它内部的多样性而以单一解释框架去“整合”各个区域史研究，这也不符合研究总体史的诉求。

由此，反思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史内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反思如何将这种理解应用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这对学术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二) 重新发现人的主体性

重新发现人(作为行为主体)的主体性，是发现当代社会史研究多样性的方法之一。在承认社会变迁的同一性、规律性和社会环境对于人的作用为优先的同时，研究者要尊重人(或群体)作为历史活动的行为主体所具备的能动性。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指导意义更为明显。研究对象的区域化正是出于对地方经验特殊性的尊重，而这种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不同区域内的人所带有的不同价值观念、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关系及行为方式。宗教、文化、阶级、社群，这些概念都不是超脱于人的存在而独立运行的。不同区域的社会风貌，最终也体现在“人”的身上。研究者面对这一情形要时刻明晰：在历史发生的最终环节，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推进了历史，而不是某种“心力”或“绝对精神”式的超人的“历史”在推动人的社会生活。这就要求我们对“人民史观”这个概念要有深刻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人民史观”就是指“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说主体性力量”。这种表述在历史哲学层面当然成立，但落实到具体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就要回答如下三个问题：首先，若“人民”这一概念只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单向度进程中成立，那如何判断一个具体的人(或群体)是不是“人民”？比如人民公社时期参与瞒产私分的农民算不算“人民”？^①其次，“历史发展”这个进程本身又是由谁来界定的？比如在60年代解散公社食堂和承认自留地与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干群是否违背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②即使这两个问题得到哲学式的回答(而不是真正从历史研究方法上给予回答)，那研究者还要面对第三个问题：不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之主体力量的(甚至开了这个进程“倒车”的)人(或群体)是否具有被社会史研究纳入视野的价值？

这三个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指出空泛的“人民史观”难以发现在既有单一叙事框架之下地方资料所揭示的特殊性，更难以发现微观视阈下行为主体的“算计”与“应付”。这种“以概念化的形式或各种匿名(无人物)的阶级、阶层、集团等集体形式出现”^③的“人”被转述为统计数字、文字表态和各种象征性符号，因而丧失了被研究者以他们自身鲜活的视角去理解他们所构成的社会史的可能。这种史观将作为行为主体的“人”降格为“英雄史观”的脚注和事例。^④柯文当初在强调采取“内部的”准绳时，也强调了从历史事件经历者本身的视角出发去理解历史这一层含义。^⑤这在操作方法

① 张昭国《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瞒产私分》，《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姚宏志《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农村救灾度荒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③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④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序，第14页。

⑤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译者代序，第17页。

上,要求研究者格外留意历史事件在不同阶段中档案表述之不同,也需要利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研究对文字资料进行互证工作。需要注意的是,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研究也有研究者误读和被访者记忆混淆的情况,但这是操作规范层面的问题,在此不详述。

(三)建构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

尝试建构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是发现多样性的另一途径。“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是美国社会学家 R. K. 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首先提出的。它是指研究者要在纷繁琐碎的资料和宏大不当的抽象理论之间找到一个对话中介,使得孤立的个案同超出个案界限的解释框架发生关联,进而由各个“中层”的理论出发去反思既有的宏大理论构想。它的出现是针对当时社会学研究的诸问题,但其逻辑同样适用于社会史研究。比如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柯文提出要根据特定情况提出“中距”的理解框架,并在保持该框架具有可演变性的前提下,展开“开放式”的讨论。^①这与“中层理论”的要求不谋而合。在社会史研究内,“中层理论”是指具有这样特征的一些理论:(1)基于地方性史料的研究得出的跨区域性结论;(2)得出的结论具有因果律的逻辑形式,可由其他区域史研究再次验证;(3)它的结论因其可证性而具有被开放讨论的能力。^②

“中层理论”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③前者是对“缩影说”的批评,后者是对研究意义琐碎这一情况的批判。这两点对于提升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生产能力大有裨益。而区域史研究的范式,因其将时间的叙事置换为空间的叙事,故使得借“中层理论”而重新发现研究价值这个尝试“具有了某种可操作性”。^④反过来,“中层理论”的出现使得区域史研究的比较分析有了相互沟通的介质,使得相对独立的案例可以被纳入到超越区域的理论中去证明和证伪,继而回应了“总体史”的诉求。

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尽管刚刚起步,却大有崛起之势。在学科建设上,当代中国社会史有很可观的前景。在向区域转向的趋势下,若那些排斥思想的“村庄故事”成为主流模式,那对学术研究非但无益,反而会影响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在开题立意前,研究者要确知研究对象具有总体史的研究意义,进而发现地方史料同既有认识的不同之处,继而将其研究重新置于学术史中审视。这就要求研究者有总体史的问题意识,发掘地方独特性的敏锐视角,以及同学术史对话的自觉。如此,研究者的努力才是找到“意义”的,是思想“在场”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并非依靠“村庄故事”的堆积而完成。必须通过反思这种只发掘史料而忽视思想的短视,研究者才能找到具有思想和灵魂的历史书写方式,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李晋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2)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张文涛)

①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译者代序,第27页。

② 杨念群、肖自强《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③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自序,第5页。

④ 杨念群《当代中国历史学何以引入中层理论》,《社会观察》2004年第7期。

SUMMARY OF ARTICLES

Fan Wenlan and His Writing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Zhao Qingyun

Fan Wenlan (1893 – 1969) was one of the pioneering scholars in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e devoted a half of his life to the writing of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hich was rare among historians in modern China. He began the writing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before 1949, with the hope to balance between factuality and practicality, or to present facts while making them applicable fo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In other words, he endeavored to apply Marxist theory in interpreting the general course of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meantime, he strove to write a history that bear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 work resulted in a brand new system in 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vely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fter 1949, he assembled a group of historians to continue the project, further improving and completing the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an Wenlan foregrounded the ro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t the social bottom in making history, which remains inspirational for all of us interested in writing general history.

On the Beginn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Zhang Yue

From the mid 19th century or after the Opium War (1839 – 1842), there emerged interests in frontier studies of China's northwest, introducing foreig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nd writing contemporary history. All of them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times in historiography. But overall, these new interests did not lead to a general overhaul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t was not until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with publications of Liang Qichao's *The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New Historiography* that historical study in China was ushered in a new era. In pursuing "new historiography," the National Essence School (Guocui xuepai) attempted to bridge over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and called for discovering China's national heritage. Hu Shi (1891 – 1962) then continued to introduce the "Reorganiz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zhengli guogu) Movement, which helped finally dissolve the boundary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Hu als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like to write a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which was aimed to transform historical study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By then, with the use of new materials, new methods and new topics that a "new trend" emerged to shape the clear path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Spot" Thinking: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History Study in Today's China // Song Xueqin, Li Jinheng

In recent years, social history study in China today has formed a new trend, changing from the interest in macro history to that of regional history. This trend in general has helped present more detailed research. But many regional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have also been content with the presentation of local sources and narrating facts, without showing in-depth analysis. The biggest problem we think is that mere source presentation without deep thinking would not bring about real progress in a field. Instead, it would only lead to the overproduction of one type of narrative history that fails to show the function of historical study. We think it necessary for practitioners of social history to develop a sense of problematic and discover the meaning of social history study at the regional level. It should examine the humans as the subjectivity of history and consult and utilize certain middle range theories in research. Only by doing so, the authors argue, that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can find its thinking right "on spot" while going through a massive amount of fragmented materials and provide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presenting history with soul and spirit, so to speak.